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
牢不可破的友誼与合作
是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强大支柱

柯·罗文著

时代出版社

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牢不可破的友誼
與合作是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強大支柱

蘇聯 柯羅文 著
魏慶禎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Е. А. Коровин

**НЕРУШИМАЯ ДРУЖБ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И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
МОГУЧИЙ ОПЛОТ МИРА
И ВСЕОБЩЕ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 1955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 北京第三版社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6年3月北京初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1—12/32 字數: 29千字

1—4, 530號 定價(7)0.14元

目 次

新型的國際關係。它的產生和基本特徵·····	4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政治合作	
及其對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意義·····	10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經濟合作及其意義·····	17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文化合作及其意義·····	32
新型的國際關係是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強大支柱·····	35

1954年對歐亞兩洲許多國家的人民和全體進步人類來說，是充滿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充滿了愉快的回憶的一年。

去年（1954年），民主陣營各國的人民慶祝了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紀念日。波蘭慶祝了從希特勒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和建立人民政權的10周年；保加利亞慶祝了人民起義，推翻法西斯制度和把國家從希特勒的佔領下拯救出來的10周年；羅馬尼亞慶祝了打倒法西斯獨裁和驅逐希特勒侵略者的10周年；阿爾巴尼亞慶祝了國家從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的10周年；捷克斯洛伐克慶祝了斯洛伐克人民起義反對希特勒佔領者的10周年。在1954年，中國人民慶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周年，德國人民也慶祝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5周年。

對各民主國家及其人民來說，1954年是回憶許多值得記憶的日子的一年；在那些日子裏，蘇聯人民和蘇軍在遭受法西斯主義奴役的各國人民的積極支援下，英勇奮戰，徹底粉碎了法西斯反動勢力的武裝力量。這就使每一個從帝國主義者的暴力下解放出來的民族都能成為自己家庭的主人，都能獨立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都能實行以新的民主原則為基礎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各民主國家和蘇聯共同組成了社會主義陣營。這個陣營的特點是：不僅參加國的內部結構是真正民主的，他們的國際政策的原則也是嶄新的，極端民主和一貫愛好和平的。

本書的任務，是從歷史發展上闡述新型的國際關係，指出它適合於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國際合作的特徵和特點，並指出新型國際合作對鞏固普遍和平與各國人民集體安全的特殊意義。

新型的國際關係。它的產生和基本特徵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蘇維埃國家建立以前，世界上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社會主義類型的國際關係，因為當時這種關係還沒有相應的基礎。

但是，從這一無可爭辯的定論中絕不能得出結論說，被剝削階級沒有自己的與剝削制度的基礎的政治上層建築截然相反的關於道德、法律、政治的原則和概念。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作為勞動人民先鋒隊的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必須有自己的國際政策原則，因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外交政策已成了工人階級為爭取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道路上的障礙。

馬克思說：“工人階級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們兄弟般的團結和合作，那末當存在有那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洒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時，他們又怎麼能完成這個偉大任務呢？”^①

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人指出，工人階級的迫切任務是要精通國際政治的秘密，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揭露剝削階級反人民的反動的國際政策，在必要時用一切可能的辦法來反抗它，以便使基本的道德和正義的法則成為國際關係上至高無上的準則。

馬克思扼要地闡述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結論，指出為這樣一種對外政策而進行的鬥爭，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鬥爭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中譯本，第一卷，第361頁。

一部分。❶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締造者和領導人列寧及其事業的忠實繼承人斯大林，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發展並總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思想遺產，規定了勞動人民掌握政權的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輪廓。

列寧和斯大林揭露了帝國主義國家及其國際政策的殘忍、掠奪和強暴的本質，並給社會主義國家的真正民主和完全民主的外交政策的基礎下了卓越的定義。

列寧教導說，社會主義應該實行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各民族的自決、自由的政治分離和自願聯合的權利。列寧非常注意各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的人民所進行的民族解放運動，他着重指出，必須實行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和殖民地解放運動與蘇維埃俄國結成最緊密的聯盟的政策。

列寧依據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和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幾個國家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取得勝利的結論，指出了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合作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列寧在1920年答美國“紐約晚報”記者問時說，蘇維埃國家在歐亞兩洲的計劃是一樣的，就是與各族人民和平共處以及同所有的國家聯合，對誰也不例外。同時，列寧強調指出：蘇維埃俄國方面對於和平的國際合作沒有任何障礙，美國及其他一切資本主義份子方面的帝國主義實踐才是這種合作的障礙。

斯大林揭示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於蘇聯在國內和國際間實行和平與各族人民友好的蘇維埃政策的意義。斯大林一再強調指出，蘇維埃國家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是以兩種對立的

❶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中譯本，第一卷，第362頁。

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和平共處為基礎的，並指出這一原理乃是蘇維埃國家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

斯大林指出了蘇維埃和平政策的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以及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的國際合作的具體形式和條件。他在許多次演說中都會指出保衛和平和揭露侵略者的規模宏大的人民運動對維護和平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的巨大意義。

蘇維埃國家誕生以前，根本談不上有無特殊的社會主義類型的國際關係的問題，因為當時還沒有一個能實行相應政策的社會主義國家；後來，由於革命無產階級、首先是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由於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自覺的提高及其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活動，才有了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原則，這種原則並成為起積極作用的歷史因素。這種原則動員勞動人民，首先是動員工人階級去積極反對資產階級的對外政策，並準備了工人階級在俄國的勝利——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蘇維埃國家建立以後，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原則（工人階級及其戰鬥的先鋒隊共產黨是這種原則的執行者）具有了新的意義；因為，這已不是國內被壓迫與被剝削的階級所執行的、與剝削階級國家的國際原則和實踐截然不同的原則，而是國家的即蘇維埃政權的原則，蘇維埃政權正堅持不渝地在蘇聯的國際關係中執行這些原則。

蘇聯外交政策所體現的社會主義國際原則，過去和現在都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政策有巨大的影響。這表現在資產階級政府極力掩飾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上，表現在新的隱蔽的殖民從屬形式（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侵佔的領土的委任統治制）的出現上，表現在國際勞工組織的建立上。這種原則的影響，也表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正式承認兩種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所有制——一律平等上（例如，1927年的日

內瓦經濟會議)，表現在承認蘇維埃國家對外貿易壟斷制上，表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被迫放棄一些露骨的奴役性條約（在土耳其和伊朗的領事裁判制度）上，表現在英國被迫給予它過去的殖民地——印度獨立上等等。

隨着十月革命的勝利，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相互關係上，開始建立了新型的國際關係；這種國際關係是他們在廣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互助的基礎上實現的自願、平等和全面的兄弟合作的表現。

由於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關係迅速地成長為聯邦制的聯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共和國的聯系便在1922年採取了國家法律的形式（蘇維埃聯邦）。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在國內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並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其結果導致了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組成、鞏固和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經濟結果，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和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市場和帝國主義陣營國家的市場——的形成；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份子在經濟上扼殺社會主義陣營的企圖（利用封鎖、各種經濟壁壘和歧視政策），實際上只不過導致了新的世界市場的鞏固。在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國際合作的過程中，它們之間建立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聯系。這些聯系是以自願、平等、互助和按“各民族自由與國際和平”這一口號的精神尊重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原則為基礎的。

我們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文件中，在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政府領導人的言論中，可以找到很多對於我們眼前產生的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真正社會主義類型的

國際關係的指示。

根據伏羅希洛夫的說法，“……這種新關係是歷史上從所未有的，可以說是各國人民間及各個國家間的關係的新典範。這些關係的基礎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是列寧—斯大林的外交政策”。^①

莫洛托夫在華沙的波蘭復興7周年慶祝大會上所作的演說中指出：承認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承認它們之間的兄弟互助和它們為社會主義勝利的事業而進行的共同鬥爭，是新型國際關係的特點。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談到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的相互關係時，他說：

“蘇聯和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國與國間一種嶄新的關係的範例，這種關係是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這種關係是建立在平等、經濟合作和尊重民族獨立的基礎上的。”^②

馬林科夫在以後的幾次演說中(1953年3月9日，1953年3月15日，1953年8月8日)，又強調指出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國際合作以及他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誼的特殊意義。

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周年慶祝大會上，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把蘇中兩國人民牢不可破的聯盟和兄弟友誼，表述為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完全新的國際關係的榜樣，表述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活生生的體現。

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政府領導人關於新型國際關係的言論是不勝枚舉的。我只舉出兩個例子來說明。

① 伏羅希洛夫：“在羅馬尼亞解放七週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摘要)，載“新華月報”1951年9月號，第1068頁。

②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1952年中譯本，第29頁。

中國共產黨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在“最偉大的友誼”一文中寫道：“偉大的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為我們的友誼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的國際主義的原則而建立起來的。中蘇兩國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全世界各國一切愛好和平、民主及正義的人民之間的友誼，也正是建立在這樣偉大的國際主義原則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顯然，我們這種友誼所產生的力量是無窮無盡和真正無敵的。”^①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領導人喬治烏一德治寫道：“在一些大國和小國之間，有史以來第一次建立了兄弟的友好關係……這種關係是以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共同性，共同的思想體系和最終目標的一致為基礎的。9億人口在統一的旗幟下團結在一個統一的陣營——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這個陣營是各國人民最偉大的成果。”^②

這樣，作為被壓迫階級的革命思想體系而產生的社會主義對外關係的原則，通過蘇維埃國家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國際政策，在我們眼前變成了國際準則、協定和慣例，變成了在世界相當大的一部分土地上起作用的具有新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和性質的國際關係。

新型國際關係以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為基礎並反映這種規律的要求，這是新型國際關係最突出的特點。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發展着他們之間各種形式的自願和平等的兄弟合作，這種合作排除任何鬥爭；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關係的特點却是尖銳無比的鬥爭和不可調和的矛盾，它們的“合作”也往往是一種鬥爭

① 毛澤東：“最偉大的友誼”，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頁。

② 見1954年8月22日“真理報”。

方式。歷史表明：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各民族的相互依賴和各國在經濟上的聯合不是通過各民族自願和平等的合作，而是靠某些民族壓迫別的民族，靠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奴役比較落後的國家的方法確立起來的。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乃是準備新的用暴力重分世界的手段，並且是根據野蠻的法律，以暴力和強制，以準備和發動戰爭，以強大的帝國主義強盜（首先是美國的壟斷集團）奴役弱小國家和民族而建立起來的；而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國際合作所抱定的崇高目的，則是保障普遍和平，保障各民族與各國的真正自由、平等和真正的獨立。

「完全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生產關係的基礎。在這個社會裏，人們的相互關係是同志合作和社會主義互助的關係。這一原則也是各社會主義國家國際合作的基礎。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僅把一個國家的勞動人民，而且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勞動人民聯合起來。」每一個國家在幫助別人的時候，也就是在幫助自己，在促進整個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鞏固；這個陣營為其參加國保證了迅速增長和繁榮、全面發展和提高的無限可能。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政治合作 及其對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意義

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所有主要外交政策問題上的行動的一致，是社會主義類型國際政治合作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這種行動的一致，是從正在建設新社會的各國人民目標的一致，是從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基礎所固有的共同特徵

中產生的。

各民主國家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中所執行的統一路綫——堅持不渝地爲爭取和平與民主，爲各族人民和各國的集體安全與平等合作而鬥爭的路綫，就是上述情況的例證。無論是恢復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應聲蟲們所無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問題，無論是停止朝鮮和印度支那的流血或限制軍備和禁用大規模殺人武器的問題，無論是關於德國人民重新統一爲一個民主和愛好和平的德國的問題或保障歐洲各國人民集體安全的問題，——在解決這類問題上，不管何時何地，具有真正主權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是結成友好與和平的統一戰線的。光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挺身援助英勇反抗美國侵略者的朝鮮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用鮮血鞏固了兩個兄弟民族的友誼，並不是偶然的。這一全體進步人類都有權引以自豪的功績，就是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在爭取和平與自由的偉大事業中互相給予兄弟援助的明證。

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所訂立的任何一個政治條約，都是和平的工具和國際合作的補充保證。我們可以舉蘇聯同各人民民主國家訂立的許許多多友好、合作和互助的條約爲例。

這些條約同資本主義國家訂立的布魯塞爾條約、北大西洋公約和其他侵略性的軍事條約截然相反，其目的純粹是防禦性的；這些條約規定共同防止德、日兩國或在政治上和侵略行爲上與德、日相勾結的國家重新發動侵略（1948年2月4日訂立的蘇羅條約第一條，1950年2月14日訂立的蘇中條約第一條等等）；條約的參加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是德、日兩國所發動的侵略的犧牲品。

這些條約的參加國都應遵守“互相尊重對方的獨立和主權

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1948年3月18日訂立的蘇保條約第五條等等)。

在各人民民主國家間訂立的政治條約中，應特別指出幾個“關於在政治和社會措施方面合作”的協定（1949年10月14日訂立的阿保條約，1948年4月5日訂立的波捷條約）。根據這些條約，締約國應在政治和社會措施的所有問題上和各個方面進行合作，以鞏固本國和國際方面的社會進步（阿保條約第一條）。

反帝國主義陣營各國的政府間所簽訂的條約和協定，不僅依靠着政府的合作，而且也依靠着各國人民——國際生活的自覺和積極的參加者——的合作；這些條約和協定都是符合各民主國家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因為締約國政府是代表人民的自主意志的政府，因為在這些國家裏人民的自主意志的原則在管理國家的事業中完整無缺地實現了。保加利亞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科拉羅夫說：“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這就是我們的條約與任何其他條約的主要區別。”

這樣的條約和協定不可能反對任何一個民族，因為它們是建立在最穩固的基礎上，並促進各民族間友好和兄弟團結的加強。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所簽訂的條約的特徵是：這些條約具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條約所不能具備的穩固性，這種穩固性是從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並為生產力提供廣闊的發展餘地的新社會的穩固性和鞏固性中產生的。

因此，這些條約的參加國在條約中載明永遠友好的政策的條款，並確信這些條約將得到永遠不變的、忠實的遵守，是完全有根據的。

表現新型國際合作的又一光輝範例，是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極其複雜的領土問題的友好與和平的解決。根據1945年6月29

日簽訂的蘇捷條約，並按照外喀爾巴阡烏克蘭人民的民意而實現的外喀爾巴阡烏克蘭的重新歸併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便可作為一個例子。下面也是這一類的例子：根據1945年8月16日簽訂的蘇波條約，波蘭的東部疆界擴大了，按照1950年6月6日簽訂的關於沿奧得—尼斯河劃分國界的協定，確定了波德兩國的國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波蘭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們在簽訂波德協定時給波德兩國的新疆界下的一個卓越的“和平疆界”的定義，就是由此而來的；這條疆界不是把兩國人民分隔開，而是把兩國人民聯合在一起。

真誠友好合作的政策是這樣緊密和牢固地把民主陣營各國連結在一起，即使在他們之間沒有什麼特別的條約義務時，他們的相互關係也同樣是建立在兄弟般的一致、互助、各方面平等、尊重主權和民族獨立的牢固的基礎上的。因此，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當時在同人民民主波蘭簽訂互助條約之前就確定兩國間的關係是友好和同盟的關係，是完全有根據的。

民主陣營各國的政治合作，對鞏固普遍和平有頭等重要意義；普遍和平是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重要的條件和前提。

人民政權的建立和民主陣營各國的緊密合作，使這些國家能夠廢除奴役性的和不平等的條約；在資產階級統治這些國家的時期，帝國主義國家曾用這些條約來束縛他們。

中國革命勝利以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委託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共同綱領”第五十五條），這並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對別的國家沒有承擔任何不平等的義務；過去，這種不平等的義務却給在華的外國資本家造成過“國中之

國”(外國租界等等)的地位。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政府也採取了同樣的步驟：波蘭廢除了同梵蒂岡訂立的條約，阿爾巴尼亞廢除了同外國列強訂立的不平等的經濟協定等等。

這些措施的實際意義是巨大的。各人民民主國家把經濟命脈掌握在國家手中，結束了本國經濟受外國壟斷資本家奴役的從屬地位，從而在實際上（而不是口頭上）保證了本國的真正主權，也就是實現了獨立，實現了自主地管理本國資源和執行獨立的對內和外交政策的權利。

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奴役性條約使外國壟斷集團能够在沒有加入帝國主義體系的國家的經濟中爲所欲爲，並把當地的資產階級政府變成外國壟斷集團的代理人，因此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本身也反映了作爲帝國主義政治的特點的極尖銳的矛盾和對抗性。反動政府爲了它自私自利的目的，故意擴大許多這樣的矛盾（民族仇視，宗教糾紛等等）。數十年來，中歐和東南歐各國一直是帝國主義列強製造陰謀活動和進行挑撥離間的對象，並且往往被它們利用來作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

正如薩布羅夫在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37周年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的，隨着人民民主制度的勝利，“這種情況是一去不復返了”。^① 結束政治上和經濟上對帝國主義的從屬地位，國家政權轉移到勞動人民手中，這些對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來說，就意味着消除不久以前還在敗壞這些國家同鄰國之間關係的國際磨擦。

1954年7月21日，貝魯特在華沙舉行的慶祝大會上說：“今天，人民波蘭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和它的鄰國處於不友好的狀況下了。相反，波蘭民族從來沒有這樣多的朋友，它不僅

^① 薩布羅夫：“在莫斯科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七周年大會上的報告”，載“新華月報”1954年，第12期，第52—56頁。